

美國漢學研究的概況 *

An Overview of Chinese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魏思齊 (Zbigniew Wesołowski) **

一、美國漢學研究的歷史脈絡

所謂 *Sinology*¹ 或今天較常用的 *Chinese Studies* 通常翻譯成中文為「漢學」，² 為對中國的知識研究，更恰當地說，它是以漢語（尤其書面語言）為基礎，對中國文化任一層面之研究及其中所得到的認識成果。

從漢學的歷史脈絡來看，它與歐洲人加強其航海能力發現「新世界」及其傳教熱忱有關，之後也直接與西方殖民主義有關。美國本身曾是一個殖民地，脫離英國而獨立，由此史實以及回顧歐洲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歷史教訓來看，美國似乎在在顯示對外國文化採取較開放與融合的態度。19 世紀中葉鴉片戰爭（1840-1842 年）後，「南京條約」迫使中國被列強轟開大門，美國也開始與中國有所接觸，與列強相較，美國是後到中國者，為了分享列強在中國的勢力範圍，美國提供了「門戶開放」政策。表面上，這是表達維持中國的獨立和主權，實際而言，種種政治、商業與宗教因素皆影響到美國漢學發展。美國學者總是強調：「美國與中國有一種特殊關係」，譬如，1900 年義和團運動失敗後要求中國賠款

的一部分，美國用來資助中國學生留美學習。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許多美國傳教士，尤其是基督教的傳教士們，旨在福傳工作，相對地，在此過程中他們也學習了中國語言和文化，於奠定美國漢學的基礎上功不可沒。

美國漢學研究的歷史脈絡應追溯至 19 世紀，同歐洲漢學一般，美國漢學研究的開端是為 19 世紀傳教士所創立的。Elijah Coleman Bridgman（裨治文，1801-1861）是第一位美國漢學家，³ 也是傳教士，屬於基督教美國公理會。1830 年 2 月 25 日他從波士頓來到廣州，當時中國尚未能公開傳教，所以他主要以學習漢語以及進行其他準備工作來做為他的生活內容。1832 年在澳門創辦並主編《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 亦名《澳門月報》），向西方介紹中國的情況，他自己也於澳門發表了不少文章，也擔任過林則徐和美國公使顧盛的譯員。

在這裡要提及兩位傳教士，即 Williams A. P. Martin（丁隴良，1827-1916）及 Young J. Allen（林樂知，1836-1907），他們的特點在於除了作傳教士與漢學家外，長期活躍於中國政壇。W. A. P. Martin 於 1850 年與其妻子

* 此篇報告是輔仁大學外語學院華裔學志漢學研究中心「推動輔仁大學外語學院各系（六系）有關其相關語言中漢學研究的現況」之部分。

** 作者為輔仁大學全人教育課程中心副教授、外語學院華裔學志漢學研究中心負責人。

1 英文 *Sinology* 的詞源是由“sino-”表示「中國（的）」、「中國人（的）」、「漢語（的）」，來自拉丁 *Sinae*（中國），阿拉伯語 *sin*，波斯語 *chini*，梵語 *cina(s)*；今日英文“China”也屬於此類詞源，也來自於「秦」（拼音：Ch'in 或 Chin）朝（西元前 221-前 206 年）及“-logy”希臘語表示「研究」、「探索」、「學說」或「科學」組成的。

2 「漢學」此名稱本身指著不同的意義：1. 指漢朝時代的經學；2. 指清朝乾嘉年代的考據學研究（跟第一個意義有關）；3. 指西方對中國的研究；4. 在日據時代的臺灣，「漢學」也指著抗拒受日本化，而自己或共同修中國的東西，如中國字、中國文學等教育內容。

3 這並不是一個普遍的看法，請參閱 Jonathan Goldstein, “America’s first Sinologist: Philadelphia’s Robert Waln, Jr. (1794-1825),” *Asian Culture* (亞洲文化) 27(1999): 1-13。

先來浙江省寧波市，之後長期在北京同文館任教，⁴並曾擔任北京東方學會的第一任會長，他也寫了不少有關中國文化與社會的文章，但其文章似乎較缺少學術性價值。Y. J. Allen 在中國的 47 年間，大部分時間在上海身兼教習、編輯、譯書與傳教士。其中，1868 年創辦並主編《教會新報》(Church News)，且於 1879 年改名《萬國公報》(A Review of the Times 或 The Globe Magazine)，為 19 世紀第一份介紹西學最集中的期刊。他的譯著有十多種，最著名的是《中東戰紀本末》(中日甲午戰爭的歷史文集，共三編 16 卷)，初編 8 卷，由蔡爾康筆述，1896 年 4 月出版，他也作西方婦女及其他文化中婦女的比較，著書《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Women in All Lands，上海，1903 年)。

以在中國的生活經歷為基礎來研究中國，並不侷限於傳教士，一些美國駐華官員在回國後也成了漢學家。其中較著名的例子為 Hosea B. Morse (馬士·摩斯，1855-1934)，他在中國稅務局任職達 33 年之久(也包括臺灣淡水關稅務司在內，當時稅務司主要由外國人管理)，非常了解對外貿易和外交情況，他最廣為人知的著作為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中華帝國對外關係、中華帝國的國際關係)，兩卷分別於 1910 和 1918 年出版，其研究資料主要靠政府的檔案，但也參考了其他漢學家的研究著作，他將近代中國與西方的關係分為三個階段：1. 鬥爭時期(1830-1860 年間)；2. 屈服時期(1860-1893 年間)及 3. 服從時期(1894-1911 年間)。

美國在亞洲及遠東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根本改變其對東亞研究的態度，即二戰後美國出現另一股中

國研究的潮流。杜維明把它叫做「一種反漢學的中國研究」。⁵此種新的中國研究走向始於二戰中的「敵情研究」，二戰時期美國研究日本，冷戰時期研究蘇聯，韓國戰爭時研究中國。在日本敵情研究中，最基本的目的為訓練從語言入手破譯其軍事方面密碼的人才，當時一大批人才中著名的有 Benjamin I. Schwartz (史華慈，1916-1999)，⁶相關研究經費來自 National Defense Act (國防法案)，由它通過了六種主要語言(Critical Languages)，中文即其中之一，當時為了研究中國有龐大的款項撥進學術界，對象為“Contemporary China”(當代中國)。以哈佛大學為例，在此將漢學轉向現代中國研究的過程中 John King Fairbank (費正清，1907-1991)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也被稱為美國“Chinese Studies”(中國研究)的開山始祖。J. K. Fairbank 以哈佛大學為其中國研究系統化與專業的基地，其中培養了一大批所謂「中國(問題)專家」或「中國通」，在目前美國重點大學中，一大批中國歷史教授是他的學生。總覽 Fairbank 的以上著作，可以發現以下三個明顯特徵：

第一，經世致用的史學思想和實踐。傳統歐洲的漢學是以中國語言文化為主要研究對象的。這似乎是一種象牙塔中的學問，是為研究而研究，為學術而學術。當然這種為求知而求知也是需要的，但 Fairbank 的學術思想和實踐與他們根本不同。他沒有系統闡述過他的學術思想，不過在 1968 年任第 83 屆美國歷史學會會長的演說中，他毫不諱言自己是主張經世治國的。他相信「研究應當具有實際的效用」，「學者的責任不僅在於增加知識，而且在於教育公眾，在於影響政策」。他在自己畢生的學術研究中始終強調歷史與現實的聯繫，強調學術

4 同文館成立於 1862 年，最初只是清廷為因應外交需要、訓練翻譯人員的機構，後來逐漸提升目標，成為培育國家人才的基地。W. A. P. Martin 是應邀在同文館教英文、國際公法，而後出任總教習長 25 年(1869-1894)之久。

5 杜維明，〈漢學、中國學與儒學〉，載於杜維明(周勤紀錄整理)，《十年機緣待儒學：東亞價值再評價》(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1999)，頁 6-8。杜維明在哈佛相繼取得碩士、博士學位，先後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柏克萊加州大學，1981 年起，迄今仍任教於哈佛大學。1988 年，杜維明獲選美國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士，現任哈佛大學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文哲所顧問委員會主席，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成員，聯合國推動文明對話傑出人士小組成員，並自 1996 年出任燕京學社社長至今。

6 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中國問題研究專家。1960 年任哈佛大學歷史與政治學教授直至逝世，兼費正清研究中心主任、美國歷史協會會員、亞洲研究會會員，以及《中國季刊》和《哈佛亞洲研究會雜誌》編委。主要著作有：《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1952)、《中國共產主義文獻史》(1954)、《毛澤東主義的「傳說」》(1960)、《共產主義與中國：思想和變革》(1968)、《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1985)、《中國研究》(1990)等。

研究與現實政治的關係。他也以這種觀念影響他的學生，使他們感到自己肩負著把老師的這種「較少狹隘性而較好準備了解東亞的自由的、現實的美國觀念發揚光大」的責任。這是他的特殊經歷及所處的特殊時代所造成的。

第二，使用中國的檔案及原始資料研究中國歷史。在 Fairbank 之前，研究中國歷史，尤其是中國對外關係史的學者，如英國的 H. B. Morse（馬士）、法國的 Henri Cordier（高第·考迪，1849-1925）、美國的 Tyler Dennett（丹涅特，1889-1949），他們幾乎僅僅根據英國的、法國的、美國的檔案資料來研究中國對外關係，認為僅有西方的檔案和西方的觀點就夠了，中國的資料是不可靠的，中國的觀點是不需要的。他們的著作嚴格說來只是英國、法國與美國對華關係史，而不是中國外交史。Fairbank 與他們不同，他開啟了使用中國檔案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新風。

第三，Fairbank 的中國研究以現代化理論為主要指導。此種視野根據 Arnold Joseph Toynbee（湯恩比，1889-1975）所謂挑戰與回應的理解模式，⁷ 即研究中國如何對西方進行回應，如此一方面希望美國了解中國，另一方面也希望中國了解美國，「其重點當然放在美國利益上」。⁸

Fairbank 認為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主要是由於西方的入侵，這在中國社會造成了極大的結構性變動，中國對西方的反應表現為一系列的改變、改革及革命，如此一來便形成了現代中國的面貌，此種史觀——即先進的、有活力的西方刺激了、帶動了落後的、停滯的中國——尤其是受到中國大陸歷史學家的批評，指其暗含白種人（西方人）的優越感，且分割了近代與前近代，使近代

中國變成沒有源頭的水，或像是沒有根的樹。70 年代諸多年輕一代的美國歷史學家，其中也包括 Fairbank 的學生，開始突破這一模式。他們逐漸強調中國傳統社會的本身自變性，成為在西方侵入中國以前，中國社會已經出現了結構性變革的因素。1984 年 Fairbank 的學生 Paul A. Cohen（保羅·科文）出版了一本總結自他的老師以來，美國史學界中國研究的著作，⁹ 是為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探究中國歷史：美國研究現代中國史的著作，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他認為「挑戰反應」模式為西方中心論在美國和學界的延續，而必須加以批判，按 Paul A. Cohen，這模式至少有兩個主要缺陷：一是忽視了中國和西方同時都是兩個變體，而不是兩個一成不變的概念；二是它影響了中國研究的全面發展，如此一來，根據此模式只注意中國社會受西方影響，而忽略根深蒂固的中國社會特徵。另一位 Fairbank 的學生 Philip A. Kuhn（孔復禮），¹⁰ 他的著作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1796-1864*（晚近中華帝國的起義及其敵人：軍事化和社會結構，1796-1864 年間，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追求將中國社會方面的本身變化因素呈現出來（如人口大幅增加、通貨膨脹指數很高、商品經濟的發展等因素）。

在中國學者方面，可以提及兩個類似的回應：一為林毓生（1934-）的 *The Crisis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Wisconsin University Press, 1979）；¹¹ 二為張灝（1937-）的 *Liang Qi-chao and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梁啟超和中國知識界的轉向，Harvard University

7 A. J. Toynbee, 英國歷史學家 A. Toynbee 之侄，曾任倫敦大學國際歷史研究教授、倫敦國際事務學會研究部主任（1925-1955），主要著作《歷史研究》（12 卷），發展了德國 Oswald Spengler（史賓格勒，1880-1936）的文化型態史觀，參閱杜維明，《十年機緣待儒學：東亞價值再評價》，頁 7。

8 參閱杜維明，《十年機緣待儒學：東亞價值再評價》。

9 Paul A. Cohen 為 Wellesley College 亞洲研究與歷史教授，也是哈佛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的顧問。

10 Philip A. Kuhn 為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系教授，他是研究中國近代史和清史的著名學者，曾任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

11 林毓生的專長是中國思想史，現職於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歷史系教授。

Press, 1971)。¹²

根據杜維明、Fairbank 的主要論述有兩個部分：一是使中國研究成為與現實有相關性的科學，並通過國防預算撥款來進行這一項工作；二是強調研究當代中國一定要研究中國現代史，而研究中國現代史一定要研究清史。¹³ Fairbank 自己這樣說：「漢學與社會科學的結合只不過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中或之後迫不得已而勉強湊合而成的」，¹⁴ 在這種發展背景下，我們可以注意到一種漢學研究方面的典範轉變：以前美國人以法國巴黎漢學研究，如 Paul Pelliot（伯西和，1878-1995 年等學者）為標準追求之；而後一方面以新的理論及積極的社會科學方法，另一方面則以傳統的「Micro-Sinology」（微／小漢學即「考證學」或「考據學」）方法。

Arthur F. Wright（芮沃壽，1913-1976）認為，¹⁵ 根據傳統漢學不得不作一門西方學術研究落後及發育遲緩的領域。¹⁶ 但有趣的是 Fairbank 和 Wright 都於 1930 年代在英國牛津作研究，不過並非以漢學家而是以歷史學家的身分。T. H. Barrett 認為像他們這樣的美國學者，對歐洲中國研究模式開始鄙視，美國區域研究的興旺發達時期（1960 年代）總括了此種感受及看法。¹⁷ 此種發展也深度影響到歐洲學研究的模式與內容：「區域研究（Area Studies）的概念成為顯學。由於結合了針對區域的專業知識與（當時看來似乎是）扎實於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復有跨學門所帶來的挑戰作引領研究的動力，學者期待中國研究對於跨學門與跨領域的諸多主題能有所貢獻。學術風氣的轉移，對傳統式的中國語言、文化、哲學、文學研究被普遍認為過時且不具吸引力。」¹⁸ 在此背景下容易了解這典範轉變的進一步發展。一方面美國教育以歐洲所謂「古典漢學」，而此種態度也包括對中國歷史研究的降低，為了更了解當代的中國，難怪

美國自 1945 年以來，已開始建立其當代中國的資料庫，此與美國當時亞洲政治角色與軍事情況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從那時在美國開始中國研究已是一件成功的事。當代美國大學中有多少中國研究的學術機構？根據 Barrett 的統計大概有一百多個，不過許多「真正」的中國研究者也在不同科系，如歷史系、社會學系、政治學系等而做教學與研究的工作。

二、美國漢學教學與研究的現況

（一）大學制度內教學與研究的漢學機構

因為相關漢學機構在美國太豐富了，筆者用了一種特殊標準來選擇一些所謂「代表大學」，即美國福特基金 1959-1970 年間以一大批錢補助的六所在美國的大學，按補助金額，以下我們進一步簡介這些相關大學的中國研究：

1. Harvard University（哈佛大學）

參閱哈佛大學亞洲及其相關課程網站，我們發現 40 個不同課程、機構與組織，「中國研究」出現在每一個單位中，而最重要的機構為東亞語言與文明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及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等。燕京學社與哈佛大學有密切聯合，但在法律及財政方面是獨立的，其目的為推動東亞及東南亞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教育的發展。

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持 9 個續辦學程，其題目的範圍自東亞藝術至中國時局，也舉辦研究計畫及主要國際研討會。該中心也提供機會予以美中學術及政策團體有對話的空間，它藉著特邀學者和提供博士學位後獎學

12 張灝在美國哈佛大學拿到碩士（1961 年）及博士（1966 年）學位，現職於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教授。

13 杜維明，《十年機緣待儒學：東亞價值再評價》，頁 6-7。

14 John King Fairbank, *China Perceived*（觀察中國），New York, 1976, p. 214.

15 Arthur F. Wright 為美國當代漢學家當中，使用循環論講授中國歷史最著名的耶魯大學教授。

16 A. F. Wright, "The Stud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Journal of History of Ideas*（觀念史期刊）21(1960): 253.

17 請參閱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亞洲研究期刊）23.4 (1964) 與之後數期中學界知名的討論。

18 請參閱 Bernhard Fuehrer（傅熊），〈對歐洲漢學研究現況的省思〉，載於魏思齊編輯《輔仁大學第一屆漢學國際研討會——「有關中國學術性的對話：以《華裔學志》為例」》（臺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4），頁 135。

金（雖其總數有限）以及不斷發展與維持專業化的圖書館來支持研究工作。假如我們翻看該中心的網頁內容，可以發現豐富的學術活動的紀錄，如中國商業、當今社會與政治時局、中國兩性研究、中國人文科學、中國宗教、臺灣研究等，值得強調的是 Taiwan Studies Workshop and Harvard Studies on Taiwan（臺灣研究工作坊及哈佛臺灣研究）。尤其是該中心圖書館所獲得的中英新書，無論質、量上都令人佩服，其內容範圍大部分限於「當代中國」。

2. University of Michigan（密西根大學）

密西根大學中國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創立於 1961 年，於美國類似機構中佔有領先的地位。該中心位於 International Institute（國際學社），其使命與特色在於提供給學生、專家及民眾卓越資料及對中國各個問題的深度了解。在研究方法方面，該中心推動多元科學領域及分析視解，相關合作者的專業學科領域為：人類學、亞洲語言與文化、經濟學、教育學、英文、歷史、藝術學院、語言學、政治學、心理學、社會學、商學院、法律學院、婦女研究課程等，總共 33 位專家，其中有著名的中國語言歷史語音學家 William Baxter。

3. Columbia University（哥倫比亞大學）

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該系提供有關中國、日本和韓國文化不同領域的課程及培養語言能力是其重點。如此一來，在大學部可以主修東方研究，同時有學科領域的專業化，如人類學、藝術史、經濟學、歷史學、文學、哲學、政治科學、社會學或宗教學。另外，還設有中國法律中心（The Center for Chinese Legal Studies, CCLS），該中心位於 Columbia Law School（哥倫比亞法律學院），創立於 1983 年，在美國自 70 年代以來領先於中國法律研究領域，並提供美國在中國法律方面最廣泛的課程，其主題涉及國際貿易、媒體與環境問題。除

此之外，學生可以在教授合作下進行一些獨創的中國法律研究。

Weatherhand East Asian Institute（魏德海東亞學社）：該學社推動哥倫比亞大學部對東亞研究與工作的興趣，其管道為擴展東亞研究學程（www.exeas.org）及該學社的學程。Columbia University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哥倫比亞中國學生與學者協會）：有 1,000 多位成員，目的在於互相幫助、支持及推動中國文化。

4. Berkeley University（柏克萊大學，漢學始於 1895 年）

加州大學柏克萊中國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作為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東亞研究學社）中最大及最有活力的研究單位，於 1957 年由美國福特基金及加州政府創立，其目的在於協調與推動對當代中國的研究。該中心創始時的研究重點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相關題目，不過目前中心的學術活動不限於中國大陸，也包括臺灣、香港及東南亞社會研究。除此之外，該中心也提供語言上的訓練以及負責編纂幾本中國當代使用辭典，亦出版叢書系列及學術活動的相關論著。該中心除關注“All Areas of China Studies”（中國學的所有領域）之外，¹⁹ 也具有一個豐富的課外活動計畫；除一般課程及學術報告會外，亦舉辦一年一度的研討會及規模較小的討論會，邀請美國學者專家共同討論重要的研究課題。總體而言，加州大學柏克萊中國研究以東亞語言與文化系和東亞研究學社（其中有中國研究中心）為主，加上 East Asian Library（東亞圖書館），現今柏克萊校方打算蓋 Chang-Lin Tien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田長霖東亞研究中心），²⁰ 將來，此大樓容納柏克萊校園所有東亞研究（包括中國研究在內）。

5.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華盛頓大學）

華盛頓大學東亞中心（East Asian Center）由美國教育部於 1964 年創立，作為一所國家研究中心，該中心

19 斜體來自筆者，在這裡用名詞“China”，而不是形容詞“Chinese”，這是英文上非常特別的用法，中文較通順地可以翻譯為「中國學」。

20 田長霖（1935-2002），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第七任校長（1990-1997），也是美國知名大學中第一個亞裔與華裔校長，機械工程專家及科技發展者。

與華盛頓大學的學術機構合作，並設有東亞資料中心（East Asia Resource Center, EARC）為全國 K-12 美國教育家提供豐富的擴大服務的學程，幫助國小、國中、高中教師如何更好地教授有關東亞方面的課程資料，它安排協助的方法如：進行一天工作坊、30 小時學程、暑期計畫、亞洲研究遊歷、資料收集、EARC 全部課程資料手冊及季度時事通訊。

華盛頓大學亞洲語言及文學系（Department of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創立於 1969 年，但早於 1909 年華盛頓已有 Department of Oriental History, Literature, and Institutions（東方歷史、文學及機構系），由著名的亞洲專家 the Reverend Herbert H. Gowen（1864-1960）所設立，自 1926 年開始教中文。

6. Cornell University（康乃爾大學）

康乃爾大學對中國研究有豐富的歷史脈絡，自 1900 至 1999 年間，在美國有三萬名中國留學生，其中 3,500 名學生（12%）在該大學就學，其中有胡適（1891-1962）和趙元任（1892-1982）。自 1879 年以來，該大學開始教中文，1950 年 Knight Biggerstaff（中國歷史退休教授）創立 Chinese Program（中國計畫），有 5 名師資，Harvard Shadick（中國文學退休教授）做過 17 年此計畫的主持人。1972 年東亞師資有 17 名，中國計畫變成“China-Japan Program”（中國—日本計畫）。另外，亞洲研究系（Department of Asian Studies）表現出高度跨學科領域的研究方法，為了更了解亞洲複雜文明，該系擁有 45 名亞洲語言、語言學、文學及宗教專業的師資。亞洲區域中心（Asian Area Centers）有三個亞洲區域中心：東亞計畫、南亞計畫及東南亞計畫，中國研究屬於東亞計畫內，康乃爾大學以實踐訓練於農業、經濟發展計畫的實行與服務業等方面為主要目標。在東亞計畫當中，有 Cornell East Asian Series（康乃爾東亞叢書系列）的 Chinese Business History（中國商業史）的系列。

（二）大學以外的漢學／中國研究機構（選擇）

在此部分，我們簡介美國大學以外與中國研究有關

的若干機構：

1.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美國東方學會）創立於 1842 年，目的在於對亞洲語言與文學的研究，此種傳統包括語言學、文學批評、文本批評、古典文獻學、銘文學、語言學、傳記、考古學、歷史研究、哲學、宗教及風俗與藝術。該學會與耶魯大學有密切關係，其擁有圖書館，並出版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美國東方學會期刊）。
2.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美國學術團體）創立於 1919 年，出版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遠東季刊）（1941-1956 年間），此季刊自 1956 年以來改名為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亞洲研究期刊），在推動與發展區域研究有很大的貢獻。
3.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亞洲研究學會）於 1941 年創立，1970 年設立四個選任的區域委員會：（1）South Asia Council（南亞委員會）；（2）Southeast Asia Council（東南亞委員會）；（3）China and Inner Asia Council（中國與內陸亞洲／內亞委員會）；（4）Northeast Asia Council（東北亞委員會）。自 1977 年以降，該學會有 Council of Conferences（會議聯絡會），為的是連絡美國不同地方的學者；並出版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亞洲研究期刊）。
4.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美國中國研究學會）創立於 1959 年，為美國唯一類似的學會——只限於中國研究，其目的為鼓勵對中國的研究，尤其是在美國教育機構，並藉著資訊的學術交流來推動研究與教學，在中國研究上，推動東南亞了解與溝通；出版品有 *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美國中國研究期刊），*AACS Newsletter*（該學會通訊）。

三、當代美國漢學的研究範例與特徵

（一）“Contemporary China”（當代中國）²¹ 現象與“Area Studies”（區域研究）

Fairbank 被視為美國中國研究（Chinese Studies or

21 此內容根據 Yves Viltard 的論文“The Birth of ‘Contemporary China’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Archaeology of an American Sinological Determination”（「當代中國」的延伸在美國：美國漢學決定性之來龍去脈），載於 *China Perspectives*（中國視角）25(1999): 60-81。

China Studies) 的開山祖師，這也包括美國的漢學研究逐漸轉為中國研究所取代的發展趨向。其中，美國所推動的「當代中國研究」起了決定性作用。

1959 年 1 月美國 *Annals of 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政治與社會科學院年報) 以中國為主要内容出版特集 “Contemporary China and the Chinese” (當代中國及中國人)，其導論中 Howard L. Boorman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於綱領性內容中提出：「在此種情況下 (共產黨的中國作為當代亞洲政治主要因素，及西方傳統中國研究以歷史與人文科學為主)，美國大學目前有一個獨一無二的機會，發展對當代中國問題經驗及分析的研究方法，與擴大社會科學領域的使用。²²

推動此種研究走向的聲音並非只有美國才有，還有代表西方國際漢學團體的新論述，譬如法國於 1959 年 1 月 1 日創立 Documentation Centre on Contemporary China (中國當代檔案中心)，其負責人為 Jacques Guillermaz (紀業馬，1911-1998 年)，²³ 在英國漢學方面也有類似的發展。而在中國研究的歷史部分有一種任意性的分野：“Traditional China” (傳統中國)、“Modern China” (近代中國) 與 “Contemporary China” (當代中國)。“Contemporary China 意謂著自 1949 年至今；“Modern China” 主要意指 1850 年代至 1950 年代 (即中國與西方衝突，鴉片戰爭至共產黨於中國之興)，而 “Traditional China” 則代表 1850 年代之前的中國。無論我們如何去判斷此歷史分野的任意性，它明確地開始表現出漢學 (傳統中國) 與中國研究 (近代與當代中國的研究) 之分裂。另外，我們可以發現 “Contemporary China” 作為對中國自 1949 年以來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政治制度之轉喻。“Contemporary China” 此名稱及其所代表的內容

是在 1958 年至 1960 年間，成為一種流行的課題，在此論述中出現了較普遍的問題意識——即專業化 (專業知識) 之認識論上的問題。

對「當代中國」而言，這代表重新尋找傳統漢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均勢。這兒也找到了明確正當的理由，即將中國研究當作是「國家 (美國) 利益」(National Interest)。美國自冷戰以降，歷經韓戰以及 1950 年代初期至中葉的麥卡錫主義 (McCarthyism)，漢學因政治而有著多舛的命運。漢學團體被認為促成了 “the loss of China” (失去中國)，²⁴ 漢學界及其專業也因此敗壞了名聲，其中著名的學者或外交官都受到了美國國會委員會的嚴密審訊。在美國他們被稱為 “China Hands” (原指 19 世紀中國商埠的西方商人，後來意指西方「中國通」，中國語言、文化及中國人的專家) 意指「失去」中國的駐華使領人員，他們支持美國政府跟中國共產黨合作，而放棄中國國民黨。中共掌權後，他們被看作共產主義者，較著名的 “China Hands” 為 John Paton Davies, John S. Service, John Carter Vincent, O. Edmund Clubb, Owen Lattimore 及 J. K. Fairbank。²⁵ 之後，中國研究者兢兢業業地逐漸重建相關機構，如上所提，亞洲研究學會 (AAS) 於 1956 年繼承了 1948 年建立的 Far Eastern Association (遠東學會)，並對政治活動採取謹慎的態度，其章程特別提及：「是科學而非政治……」。不過 Howard L. Boorman 於 1959 年 “Contemporary China” 綱領性文件反對當時美國政府的立場，認為中國共產黨政府和中國文化與社會無關，只仰賴蘇聯的支持而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傳之後，中共根本沒崩潰，所以中國本身變成了「中國問題」，那麼需要學術界重新以其特殊方法探究，重新解決「中國問題」的渴望，帶來

22 筆者譯，同上註，頁 60。

23 1953 年 Jacques Guillermaz 已經創辦了當代中國研究機構，之後才有相關資料中心。

24 同註 21，頁 67，此種論點我們找到 Anthony Kubek, *How the Far East Was Lost: American Policy and Creation of Communist China, 1941-1949* (如何失去遠東：美國政策與共產黨中國的創造，1941-1949) (London: Intercontext Publishers, 1971)。

25 請參閱 J. K. Fairbank, *Chinaboun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 Owen Lattimore, *Ordeal by Slander* (Boston: Little, Brown, 1950); Gary May, *China Scapegoat, the Diplomatic Ordeal of John Carter Vincent* (Prospect Height: Waveland Press, 1982); O. Edmund Clubb, *The Witness and 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Lewis McCarroll Purifoy, *Harry Truman's China Policy, McCarthyism and the Diplomacy of Hysteria, 1947-1951* (New York: New Viewpoints, 1976); Robert P. Newman, *Owen Lattimore and the "Loss" of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E. J. Kahn, Jr., *The China Hands*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72)。

了兩方面的發展，一是在學術方面，二是在政治方面。

在學術方面，認同了一個具體研究的對象，即「共產主義的中國」(Communist China)，同時有一種認識論上的討論，即美國的中國專家面對社會科學(尤其政治科學)與漢學傳統之間的選擇，而對 Boorman 而言並非是很難的選擇，他以政治方面的專家身分出現，而進一步對“Contemporary China”下定義。在政治方面，我們已有上述提及的「國家(美國)利益」。

中國專家在此看見新的機會以結束麥卡錫主義的負面影響。Fairbank 跟著 Boorman 亦參與此討論，當時他為亞洲研究學會的主席，於 1959 年 3 月 29 日的 AAS 年度會議中演講“A Synthesis on a Pluralist Basis”(多元基礎上的綜合)，²⁶除了綜合了漢學傳統與社會科學以外，也綜合了新的文化——即革命性東方與自由主義及民主主義的美國傳統。此文化綜合應形成“new pluralist world culture”(新與多元化的世界文化)，²⁷也相當具有張力，因其相互認同及接受，而非放棄彼此的原則。

以上已概述 Fairbank 的貢獻，總括其思想與工作，我們可以說 Fairbank 一方面對比社會科學、技術、現代狀態、共產主義和中國；另一方面，將漢學、人文科學、人道主義、民主主義、個人自由及美國，在此對比過程中綜合，這是他思想與行動的特徵。

美國之中國研究的下一階段是將“Contemporary China”的機構化。Fairbank 作為 AAS Consultative Commission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亞洲研究學會研究與發展資訊委員會)主席時，召開一個名為「當代中國研究」研討會(1959 年 6 月 18-21 日)。此研討會創立了 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當代中國聯合委員會)。

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ACLS)和社會科學研究學會任命 George Taylor 為主席，任期 4 年，該委員會內建

立三個專門小組：

1. 1961 年 Subcommittee on Research on Chinese Society(中國社會研究小組)，先由 J. C. Pelznel 主持，之後由 G. W. Skinner 主持。²⁸
2. 1965 年 Subcommittee on Chinese Law(中國法律小組)由 J. A. Cohen 主持。
3. 1965 年 Subcommittee on Chines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中國政府與政治小組)，由 R. A. Scalapino 主持，²⁹此小組包含 Doak Barnett、J. M. Lindbeck 及 G. Taylor。在「當代中國機構化」的過程當中，Fairbank(自由派)與 G. Taylor(保守派)的貢獻最大，前者專長在於學術和專業知識方面，以及憑進取的精神態度拓展哈佛大學之中國研究；後者的優點在於積極連接漢學界與政府和政治界。在此中國專家重新接受政府與經濟機構。機構合作中，比較突出的為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the Ford Foundation(福特基金會)、CFR 及 RAND Corporation。

自 1957 年以降，當代中國研究逐漸受到歡迎，一方面代表美國對非西方世界重新燃起興趣，另一方面也回應了當時中蘇衝突。在此背景下，相關的經費補助也很豐富，自 1959-1969 年大約有 4 千萬美元補助款。³⁰經費大部分來自公用補助(Public Subsidies)，特別根據 1958 年國防教育案(the 1958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 NDEA)，它的目的為加強大學研究中心及文化區的跨文化課程(區域研究)，也包括了中國在內，譬如為了美國的中國研究，福特基金自 1959 年至 1970 年間付了 2380 萬美元，³¹這筆錢大部分用於主要大學研究機構中，主要目的是為了設立專題與多領域的中國課程，所謂主要大學，基本上指六所長期研究過去漢學方面的大學。³²

26 J. K. Fairbank, "A Note of Ambiguity: Asian Studies in Americ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1959.1): 8.

27 同上註，頁 9。

28 施堅雅，美國相當有名的社會學家。

29 斯卡拉皮諾，伯克萊大學教授，其著作《亞洲及其前途：向各主要強國提出的問題》(北京：新華出版社，1983)。

30 同註 21，頁 3。

31 同註 21，與 1952-1958 年間只付了 320 萬美元作比較。

32 1959-1969 年間哈佛大學 290 萬美元，密西根根大學 250 萬美元，哥倫比亞大學 250 萬美元，伯克萊大學 180 萬美元，華盛頓大學 170 萬美元，康奈爾大學 130 萬美元。

在這種當代中國研究過程中，美國學術界有一個較有影響力的理論，即“Development Theories”（發展理論），美國政治學者與亞洲通 Lucian Pye 是當時相關理論的化身。³³以中國而言，他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但觀其總體來說，他護衛著社會科學，或更恰當的說法是護衛著政治科學，發揮出其正當性與影響力以及批准與核定「當代中國」的誕生。難怪「當代中國」的下一發展階段為將「當代中國」研究對象完全隸屬社會科學領域。

社會科學的（更恰當地說：政治科學的）領導角色與美國政府政策及其所追求的利益是密不可分的，它的目的為改善對所謂「第三世界」的認識以及制度化的相關研究。如此一來，「第三世界」只不過是一種「實驗室」，其中「現代」學科領域（“Modern” Disciplines）使其理論經受考驗。³⁴歷史研究只不過當作輔助的科學，提供有關傳統社會的資料，為的是促成現代化的進度。「當代中國」此名稱及其所帶來漢學研究方面的分野藉著其機構化變成一種長期的現象，不過在美國自 1980 年代以來，正式研究機構在其名稱上不再使用「當代中國」的說法，也不說明為何放棄。1982 年當代中國聯合委員會本身與 Committee on the Studi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中國文明研究委員會）合併於新的 Joint Committee on Chinese Studies（聯合中國研究委員會）。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ACLS）不再特別控制「當代中國」研究。當今該研究逐漸回歸人文科學領域，即靠近「傳統漢學」。此種弔詭的發展理由何在？是由於多元科學領域性？抑或對中國歷史的豐富公平性？或有其他可能？

在以上美國當代中國研究的背景下，讓我們再提及「區域研究」的概念。美國之中國研究的進一步發展涉及當代西方學術領域的區域研究與專業學科領域之間的關係問題。漢學或中國研究是區域研究，而專業學科領域為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人類學等，關鍵問題是如何使兩者彼此配合。以上我們已經提及這個問題。在美國中國研究方面，政治學和歷史研究較為成

功。嚴格來說，歷史學本身不是一個專業學科領域，因其包含諸多其他專業領域的部分，如文化史、社會史、經學史、宗教史、思想史、科學史等，彼此間可能會有共同的語言。

「區域研究」本身提出若干研究的方法論之問題。區域研究相對於各專業學科領域是較晚崛起的，專業學科領域是先於歐洲出現的，即以西方文化為典範而發展出來的，在此種背景下，除了科學方法的普遍性問題之外，西方所發展出的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等學科領域有另外的具體問題：其他文化（如中國）所碰到的問題，是否要涵蓋在專業學科領域中區域研究有肯定的答覆。美國學術界回應以上問題有以下辦法：

一方面讓區域研究（如中國研究或漢學）分入各專業學科領域，譬如歷史系有一、二位是中國歷史專家，人類學系有一、二位是中國文化專家等，但這並非是一種共同標準的風俗，以哲學系為例，它很少有一個中國哲學專家；在此種情況下，還需要建立獨立的區域研究，即建立東亞系或院（現今美國不再建立漢學或中國研究系），之後在各專業領域取得一席之地。區域研究是由很多不同專業學科領域所組成的，以哈佛東亞語文文明系為例，³⁵至少有三個不同專業學科領域：歷史、文學和宗教思想，其背後的基礎為語言領域如中文、日文及韓文等。哈佛該系的研究還包括：法律、人類學、經濟學等所有社會科學，更不用說其他各職業學院如神學院、法學院、政治學院等。

區域研究的結果並非「交叉科學」（如物理化學是物理學與化學之間的交叉結果）的誕生，而是包容各種專業學科領域並豐富之。無論中國或歐美學術界，在當今中國研究中，有兩個似乎矛盾的立場：一是所謂「普遍價值論」（Universalism of Values），基本上也代表西方的立場；一是「中國特殊論」（Argumentation for Special Features），此立場比以上的更為複雜，但可以說是代表中國的立場。

33 白魯恂，出生於 1921 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及政治學家。

34 同註 21，頁 28。

35 同註 21，頁 8-9。

（二）當代美國關於儒家注疏傳統的研究³⁶

傳統儒家的研究總是為西方漢學的重要部分，中國研究在美國的走向也是類似的。在所謂「當代中國」的時候，很多美國學者研究儒家傳統與現代狀態和現代化的之間的關係，波士頓大學神學院前任院長 Robert C. Neville（南樂山）和他的同事 John H. Berthrong（白詩朗）與哈佛大學杜維明等共同組成的學術沙龍，就是探求儒學資源可供西方社會運用諸問題，其起點為對儒家傳統普遍性之信念。³⁷ Robert C. Neville 在他的 *Boston Confucianism: Portable Tradition in the Late-Modern World*（波士頓儒家：在後現代世界中可移植的傳統）一書，將英語世界中研究中國哲學（尤其儒家傳統）的學者分成三類：第一類是解釋型學者，即致力為翻譯和解釋經典文本（陳榮捷是典型，³⁸ 還有 William Theodore de Bary）；第三類是「規範型」學者，他們以儒家或道家學術為其主要資源，針對當代哲學中的問題進行創造性的探索，並建立了一套自身的話語。他認為 Roger T. Ames、David Hall、成中英³⁹ 以及 Wu Kuangming 最為典型；⁴⁰ 第二類是在中學與西學之間「架橋型」的學者。這類學者介於上述第一類和第三類之間，他們的主要特點是對中、西方哲學思想或觀念進行比較研究，尤其對中國哲學中的一些思想比較欣賞，認為它們對西方哲學或當代哲學研究頗有裨益。他主要舉出 Herbert Fingarette、David S. Nivison、Antonio Cua、Philip J.

Ivanhoe、Lee H. Yearley、Chang Chungyan 為例。⁴¹ 當然他也強調，上述這三類之間的劃分不是絕對的。

四、結語：美國漢學研究的特徵

以上筆者嘗試將美國當代漢學研究的不同面向大致描繪，在此總觀整個研究過程，筆者歸納出美國中國研究特徵如下：

（一）於西方國家中，美國至少在數量方面絕對佔第一名的位置，質量方面也有諸多漢學研究的傑作。從地理上來看，似乎可以用以下的形式來形容 100 多個中國研究的美國大學地區：自 Chicago 通過 New York 與 Washington 至 San Francisco。

（二）美國的中國研究模式是「區域研究」，即沒有漢學或中國研究系，而大部分有東亞語言與文化系，其中有中國研究部分中心。除此之外，每一個中國研究相關科系，在其他院系方面，從考古學到社會科學，會有作為中國研究的夥伴／同仁。

（三）美國對中國研究的重點在於所謂當代中國的範圍，不過對中國古代、中古時代、宋、明、清朝時代，補救的方法是與他系（歷史系、考古學系）合作或者創立相關的學會。

（四）從美國漢學歷史脈絡來看，它跟其他州區國家一樣，以基本宗教傳教事業開始，經過商人及外交官

36 為美國學者對儒學研究的現況報告，請參閱方朝暉，〈儒家在美國：動向與反思〉，載於：<http://www.ica.org.cn/content/view.asp?id=5821>；亦請參閱「中國儒學網」：<http://www.confuchina.com/> 以及 Wesleyan Confucian Etext Project（衛斯理儒家線上資料計畫）：<http://sangle.web.wesleyan.edu/etext/cep.html>。

37 請參閱 Neville, Robert Cummings, *Boston Confucianism: Portable Tradition in the Late-Modern World* (Albany, N. 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00)。

38 Wing-tsit Chan(1901-1994) 在儒家思想學說向西方世界的傳播方面做出了傑出的貢獻，被稱為「北美大儒學拓荒者」。

39 成中英出生於 1935 年，美國夏威夷大學哲學系教授。

40 Wu Kuangming 為密西根大學教授。

41 Herbert Fingarette 為加利福尼亞大學退休教授，著有 *Confucius: The Secular as Sacred*（孔子：既聖而凡）(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2)；David S. Nivison 出生於 1923 年，現為斯坦福大學退休教授，長期從事中國思想史；Antonio Cua 為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美國天主教大學）退休教授，中國倫理學專家，擔任 *Encyclopedia of Chinese Philosophy*（中國哲學百科全書）(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3) 的主編；Philip J. Ivanhoe 是 David S. Nivison 的學生，為著名的漢學家兼哲學家、現為波士頓大學哲學系教授；Lee H. Yearley 現為美國史丹佛大學宗教系教授，中西方哲學家比較研究者；Chang Chungyan 為駐美國的中國哲學專家，筆者無法找其詳細資訊。

員的協助，發展到學術的學科領域。在美國，尤其自二戰以來，中國研究跟政治有密切及敏感的關係。基本上，美國整個科學研究屬於「國家利益」的政策。其中也有，有一個執行的原則，叫做“Political Correctness”（政治正確）。但基本上，政治正確想要代表我們人類的平等性，不論我們的意識形態內容如何，我們應該互相尊重。這種精神態度當然沒有什麼疑慮，不過其執行的方法可能帶來一些疑慮。美國的中國研究在西方是如此重要，以致其影響到國際漢學的氣氛，不過藉由報刊評審機構（*Refereed Journals*）和會議觀察員，原來想要維護國際漢學上的政治正確性，控制西方漢學研究的主流。政治正確性基於一種「世界普遍主義」的精神立場，為的是避免美國民族／文化中心主義的嫌疑，以及優勢感，如此嚴格去遵守政治正確性的思想，甚至不敢提及任何彼此之間的區別差異。雖然在美國漢學界，也有另類的人物比較強調文化間的差異性，如哲學家兼漢學家不幸已故的 David Hall（霍爾·郝大維）及 Roger T. Ames（安

樂哲）等人，但於此方面，歐美之間有一場「文化鬥爭」，歐美漢學間的決鬥結果似乎也決定了美式政治正確性的思想已經擴展在國際漢學界中。無論如何，雙方應服膺於客觀真理及相對化其個別的意識形態。

（六）美國漢學界從一開始便很慷慨地任用其他西方國家的著名漢學家，如來自德國、法國與英國等國家，至今仍持有此種態度。

（七）美國漢學界還有一個跟其他西方國家不同的特徵，即中國人本身對美國的漢學／美國的中國研究的重大貢獻。自第一位哈佛大學的中國教授戈鯤化（1838-1882），經過陳榮捷（1901-1999）至今的成中英或 Wu Kuangming，正因為有了以上這些美國華僑在美國漢學／中國研究等多方面教學，對收藏與管理圖書資料的幫助，才能在美國比其他西方國家有著更豐富的研究。真的很難想像如果沒有華裔美國人的貢獻，當代美國的漢學／中國研究將為何？

Research Grant Applications to Assist Foreign Scholars in Chinese Studies

※ A direct round-trip ticket between the domicile of grant recipients and Taipei is provided; monthly grants are awarded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scale :

Full Professor	NT\$ 60,000	Associate Professor	NT\$ 50,000
Assistant Professor	NT\$ 40,000	Doctoral Candidate	NT\$ 30,000

※ Accidental death and disability insurance of NT \$1million (and medical insurance for up to NT\$50,000 in the case of an injury) will be provided for the grant tenure.

※ Grants are awarded for between three months and one year.

※ Applicants should submit the following materials:

- 1) Application form
- 2) Curriculum vitae (including a list of publications)
- 3) Research plan
- 4) At least one 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 Deadline for applications is May 31

※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contact us at: Liaison Divisio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20 Chungshan South Road, Taipei, Taiwan 10001, R.O.C.

Tel: 886-2-2314-7321

Fax: 886-2-2371-2126

E-mail: ccsgrant@msg.ncl.edu.tw

<http://ccs.ncl.edu.tw>